

“多少楼台烟雨中” ——从杜牧诗看自然之道中的历史感

邝龔子

摘要:唐代喜欢咏史怀古的诗人很多,杜牧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杜牧诗中涉及咏史怀古主题的篇什,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历史感;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及希望以古训今的情思,是他和历代怀着社会理想的诗人相通之处。然杜牧诗中的历史感更深刻之处,在于他能领悟历史过程偶然和不测的一面,进而神思方外,从历史范围外观照历史,显示出它在自然宇宙中短暂、微小和渺茫的性质。诗人转念于人间兴衰和自然运化之际,往复于入世、出世与关切、淡泊之间,体会到置身于无涯无尽时空里的人间历史,其轮廓和意义都不再清晰确定。这种如暗雾桎枝、遥空过鸟、烟雨楼台的精神和艺术视象,同时有别于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的历史哲学观,是诗人超越而透视性的历史感最独特同时也最易被忽略的地方,隐然有自成一家的意味。

关键词:咏史怀古;历史感;自然之道;绝句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人,向来都怀有一份深刻的历史感。譬如《论语》中的孔子,就不时上溯尧舜、文王及周公,以之作为阐释其仁政之道的依据。而用历史人事为题材歌咏感想和生命观的诗篇,自晋代起亦逐渐发展为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类型,到唐代而大盛。大体来说,展现于诗歌中最典型的历史感,应该是缘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及希望以古训今的情思,可以视为儒家情怀的入世历史感。另一方面,某些诗人亦在诗歌中表达出世式的历史感,即从超乎人间世的道家角度、自然宇宙之道的层面去观照历史。唐代喜欢咏史怀古的诗人很多,晚唐杜牧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杜牧诗中涉及咏史怀古主题的篇什,呈现出不同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感;对国家苍生的关心以及借古鉴今的情思,是他和历代怀着社会理想的诗人相通的地方。然而樊川诗的历史感更深刻之处,在于他能够领悟历史过程中深层次的偶然和不测的一面,再进而神思方外,从历史范围以外的高远之处观照历史,显示出它在自然宇宙中短暂、渺小和微茫的本质。诗人转念于人间兴衰和自然荣悴之际,往复于入世、出世与关切、淡泊之间,体会到放置于无涯无尽时空里的人间历史,其轮廓和意义都不再清晰确实。这种把历史喻作暗雾桎枝、遥空过鸟、烟雨楼台的艺术视象,同时有别于儒家和道家的历史哲学观,是诗人透视性的历史感最独特而最易被忽略的地方,隐然有几分自成一家的超拔气象。正因为20世纪对这位晚唐诗坛巨擘的研究工作并不“热闹”^①,本文的课题应该更

收稿日期:2015-12-23

作者简介:邝龔子,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词、比较文学与诗学等方面的研究。

① 学者对杜牧研究的规模,远远落后于和他齐名的李商隐。最近一本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著作,对韩愈、白居易及李商隐的研究情况均作专章讨论,对杜牧则只能按比例地简短介绍。见余恕诚主编:《中国诗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6页。另一本性类近的著作则选取重点作介绍,杜牧不在其列。见羊列荣:《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具有探讨的价值。

首先应该指出,历史和诗文纪录中的杜牧,绝不仅是一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的风流才子形象。时人称赞他“真王佐才”^①;《新唐书》本传亦形容他“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②杜牧则谓自己“褊狃”“俯仰进趋……不能逐人”“知邪柔利己,……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③,是个不肯苟合俯仰、嫉恶如仇的人。杜牧出身于有着书香儒业的家学传统且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祖父是三朝为相、撰写《通典》考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杜佑,无怪他“少小孜孜,至(长)不怠”。^④自幼“内怀经济之略,外骋豪宕之才”的诗人^⑤,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作品中表现出经世安邦的胸襟和抱负。^⑥尤其是身处于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生疾苦的内忧外患时代,更使他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不忘思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⑦众所周知,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威信自安史之乱后江河日下,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军阀们各拥地方军政财赋大权,世袭自封,漠视朝廷,残害民生。至于中央政治,则长期陷于宦官专权和朋党相争之中。民生方面,两税法行久生弊,不但加剧土地兼并,导致物价失衡,而且因为连年用武而“重加税率,修缮兵甲”^⑧;苛捐杂税加上宦官、藩镇、官吏各级层层剥削,都令百姓民不聊生。至于外患则自安史之乱后,吐蕃、南诏等民族不时进犯,加深了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总之,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民生崩溃、外族侵扰的内忧外患,成为唐代后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普遍状况。^⑨

与心怀理想的传统士人一样,杜牧对天下事物和世道传承怀着早已内化于心的使命感,对历史也具备敏锐的意识,特别是对历史以古照今的作用尤契于心。从最基本的意义理解,历史可以说是对何事发生于何时何地、如何及为何发生、何人谋划、带来何种效果或影响的回溯性组织与叙述。然而像《诗经·大雅》中的《公刘》《绵》《文王》等史诗式的诗篇,早就反映出历史对于古人不只是纪实性的“镜子”,更是指引现在与将来的“明灯”。孔子固然借尧舜周公的典范谈仁论世;孟子更每以先王之道劝喻君主。事实上,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就形成一种“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的士人类型,不因孤独坎坷而改变气节抱负,始终立志济苍生安社稷。留意历史兴亡和感慨古今世事,则是此类士人集体意识中的基本要素,因为历史建构于过去、思考于现在而展望于将来,故眼前的政治社会现实无疑是历史的一部分。英国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对话”^⑩,这是就历史认识论而言。就历史意义来说,法国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

②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附《杜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97页。用杜牧本人的话说,则是“某疏愚于情,不识机括,独好读书,读之多矣。每见君臣治乱之间,兴亡谏诤之道,遐想其人,纸笔和墨,则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则烹身灭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欧阳灼校注:《杜牧集》卷一二《与人论谏书》,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174页)

③ 分别见《杜牧集》中《长安送友人游湖南》《上李中丞书》及《上池州李使君书》。

④ 欧阳灼校注:《杜牧集》卷一二《上李中丞书》,第173页。

⑤ 吴锡麒:《杜樊川集序》,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⑥ 例如《张保皋郑年传》《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记》《感怀诗》等篇,都表现出诗人为民请命、心虑国事的襟怀和抱负。

⑦ 欧阳灼校注:《杜牧集》卷一二《上李中丞书》,第173页。

⑧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38页。

⑨ 有关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政治、社会及经济情况,可参看史念海、陈光崇编:《中古时代·隋唐时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6卷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421、695-697、708-714页;及下册中有关传记,如第40、42、43、44章。

⑩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35.

哲学家阿隆则谓“历史是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而对死者生活的重建”^①,意思是除了认知的追求外,重建死者的生活是因为它跟后人的生活有相通之理。卡尔亦认为历史与人类的价值观、方向感和进步动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②唐末周昙在其现存一百九十五首《咏史诗》的起始二首中,开宗明义说“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以及“考摭妍媸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③所谓“观古知今”或“裁古献今”,就是希望历史题材发挥“资治通鉴”的教育作用。杜牧曾说过“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阿房宫赋》),而了解千万人的心,庶几是历史在人文层面上的最终意义,亦是过去的纪录对现在和将来的启示。关心个人得失以外的历史,或者由关心眼前人事延伸到千古往昔,都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思。何况留意历史,在手法上是希望以古喻今,在实践上是启导目下人世的开展,在体会上是尝试领悟天下之道,在感情上是与先贤结为知己,让他们的德行怀抱引领自己任重道远的历程。故所谓历史感,是一种缘史而发、从格物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感恩,是自微观而宏观的视象。

因此,古代诗歌早就发展出含有咏史或怀古意味的篇什,而它们亦从来不限于仅仅叙述发生过的人事:《诗经》中某些歌颂殷、周祖先功绩的《大雅》及《颂》诗,已含有取材于古而着意于今的意识;《离骚》中屈原评论先王得失,既述史亦抒怀;班固的《咏史》被称为“质木无文”,但仍然包括“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缙紫”的个人感慨;左思的《咏史》八首更建立了借史事咏怀和讽谕的先例,既表达自己的才华抱负,揭露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又抒发个人壮志不遂的激愤,慨叹贤才自古多遭困厄。无怪乎到南朝萧统编辑《文选》时,已经列有“咏史”一类的诗作。^④在发展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咏史篇什逐步转向“怀古”的情调。例如左思的诗作把历史人事用作比照参验的典故或媒介,从而展现诗人本身的怀抱和观念。又如陶潜时常在作品中惦记着“先师遗训”,提到“怀古(于)田舍”,自问“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比贤”,往往抒发着“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意绪,表达诗人跟历史人物的神交之情。^⑤左思和陶渊明的胸襟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咏史之时都以主观的抒情表意注入客观的述史叙事,使咏史成为“言志”“缘情”的诗歌基本类型的其中一脉。^⑥特别是近体诗兴起以后,诗歌创作的体式和手法都愈趋浓缩精炼,对史事的叙述也加速转化为一种凝聚往昔人事之精神意韵的模式,使咏史篇什更多时候由叙述转而呈现为抒情或议论性的怀古之作。

清人何焯曾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左思)多摭胸臆,乃又其变。”^⑦王夫之评论班固的《咏史》时亦谓:“或缚其简,或节其余,就彼语结赞,无事

① 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and ed. Miriam Cona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p. 6. 阿隆亦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见同书第7页。

② Edward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p. 173-176.

③ 分别为《吟叙》及《闲吟》,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二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337页。

④ 见《文选》卷二一,其中收录了王粲、曹植、左思、张协、卢谌、谢瞻、颜延年、鲍照、虞羲共九家二十一首咏史诗。实际的咏史诗作当然远多于此数;单举陶潜为例,已有《咏贫士》七首(其中第三至第七首均以历史人物为题材),以及《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其余借古人抒意的篇章更无庸赘述。

⑤ 分别见《荣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咏贫士七首》其二、《和郭主簿二首》其二,及《咏荆轲》各篇。

⑥ 关于“言志”“缘情”的义蕴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辩很多,但其中心含意仍不难掌握。《毛诗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对于“志”字,许慎《说文解字》中“心部”下释为:“志,意也;从心,之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谈到“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疏道:“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5页)综合来说,“志”是动于心中的情怀意念,含义甚广,涵盖今日常所谓情感(heart)、理智(mind)、精神(spirit)、意志(will)等范畴。因此“诗缘情”毕竟只是突出了“诗言志”的源始部分,“情志一也”亦是这个层面的意思。若把“志”字拆为“士之心”,亦庶几近之。

⑦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溢词,史笔诗才有合辙。”^①这是咏史传统的支脉之一。然而不论从诗歌美学或者诗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所谓“概括本传”、平直叙事的“正体”只是一种较疏隔而偏狭的模式,跟以“变体”为“正体”,随意融会议论、叙事、抒情的咏史怀古诗作背道而驰。事实上,到了古典诗歌黄金时期的唐代,“咏史”已普遍与以“怀古”“览古”“述古”“古意”“咏怀古迹”等为题目的篇什汇流,抒写类似的题材和感想。尽管初唐的作品整体仍未突破“叙赞”历史人事的疏离模式^②,然而踏入盛唐以后,很多诗人都在咏史怀古诗作中把史实、议论、抒情、叙事结合在一起,使感性和理性、意象和逻辑、往昔和未来融为有机的艺术整体。到了忧患交织的晚唐,士人们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以至生命意义的焦虑和困惑,促成了一种更普遍而深沉的反省意识,使他们更多时候透过思考往昔,抒发对现实的感想和解救世局的意绪,而晚唐时期,亦因此成为咏史怀古诗作大放异彩的年代。^③

从概念上理解,咏史诗可以被视为一种就实际的历史人事表达想法、相对理性的议论模式,而怀古诗则属于较为感性的思情,因诗人身临古迹或缅怀往昔而抒发感慨。可是具体的诗作,却并不囿于这种抽象的定位和界限。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谓“咏史者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④,无异指出咏史怀古最终归属于咏怀,是诗人借往昔人物、古迹、历史事件的题材发挥,或讽谕现实,或寄托怀抱理想,或抒发个人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是感发性的诗歌有别于以理性因果逻辑运笔的史评,不必确切肯定和系统分明,更可以缭绕往复、迷茫飘渺、随意入诗。而诗人对历史的感慨,自然也不必限于那些开宗明义以“咏史”或“怀古”为题目、以往昔人事为直接题材的篇什,譬如从“嬴氏乱天纪”到桃花源社会的投射,岂非是同一份对历史的思情?因此,我们不必反对种种对咏史诗和怀古诗所下的定义和概念划分,但亦无需采取传统分门别类的方法,把杜牧有关历史题材的篇什分作“吊古”与“咏史”,或者就咏史诗分为“发论”“寄托”“偶感”或者“抒怀型”“叙事型”等组别而进行形态性的论述。^⑤因为分门别类式的思维,可能妨碍我们更深入而全面地了解诗人的历史精神和情感,尤其是当它早就远超出一般的类别或者传统的人世范围。换句话说,此处没有用“咏史怀古诗”而以较模糊的“历史感”为论题,正是希望更灵活弹性地探索诗人在思考历史过程中的心脉流动。樊川诗中所展露的深刻“自然历史感”及其对人事今古之于自然的独到体会,特别是诗人对历史之偶然性及渺小微茫的宇宙性领悟,就是此处尝试探讨的课题。

一、“方内”的反思及对小历史的关心

对历史的反思无疑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譬如说宏观或微观式的,循人事之理或者自然之道的。历史感往往结合着个人咏怀及整体思考,既是贯通眼前及往昔人事的客观体会,同时亦表达主观的情志抱负及对人世的理想。因此上面提过,这份纵观性的历史感在时间上虽然是往溯的,眼界上却是目下及前瞻的,或者是贯通今古地从世事人生乃至时间自然中悟出一种透视性

① 《古诗评选》卷四“五言古诗一”,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古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②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③ 有学者曾对唐代咏史(包括怀古)诗进行分期统计,指出晚唐咏史诗及咏史作者的数量明显多于初唐、盛唐及中唐时期,而在唐代诗作及诗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亦远较其它时期大。见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由于咏史怀古诗无法截然界定范围,此文所记数字的绝对准确性或有商榷之处,但大体可以成立。文中亦指出咏史专集首次出现于晚唐。

④ 《南卷·论文意》,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⑤ 见陶瑞芝、陈景贤:《论杜牧的怀古诗》(陶瑞芝:《杜甫杜牧诗论丛》,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188页)、李宜涯:《晚唐咏史诗与平话演义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7页)对咏史诗定义的综述。有关内地20世纪90年代论述杜牧咏史诗的梗概,可见王丹:《90年代杜牧研究综述》,《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的领会。这些反思视乎个人的胸襟智慧而呈现出不同的深度和广度,未必明显见于每一位诗人的创作;然而在“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的杜牧笔下,却是全面而深刻地展开出来。自然历史感最终是宏观的,然而诗人的关心,首先着眼于入世的苍生层面上。杜牧立志以“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使“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当然留意历史进程由治入乱的内外因素。^①勉励亲弟坚持“直道事人男子业”(《送杜顼赴润州幕》)的诗人,对古今残暴昏庸的君主及民生的苦痛感受特别深刻,把远古近史都融入匡辅当世的意念之中。这跟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所有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②的观点不无相通之处。先就距离诗人身处年代不远的历史而论,《感怀诗》就勾画出唐代政治由盛入衰的一个历史轮廓,其中写到“流极蒙龙,网罗渐离弛,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悲叹安史之乱后数十年间藩镇跋扈、法纪废弛之祸,慨问“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同样地,《河湟》表达对河西陇右“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沦陷区人民的关怀,希望当世君主能如“宪宗皇帝亦留神”,自己可以像“元载相公曾借箸”那样替国家筹策,诗中的历史感和经世感交织在一起。说得远一点,《台城曲二首》之一批评陈后主“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那种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扬州三首》之三指出隋炀帝亡国“自是荒淫罪”,与人无尤;《阿房宫赋》斥责秦始皇不念苍生,“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地“纷奢……骄固”,从而讽刺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的恶行。^③《阿房宫赋》指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更重要的意旨是进一步提醒后世君主须善于吸取教训,才不致重蹈覆辙,为害万民,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悲惨命运。借文章论史表意述志,希望令君主鉴往知来而警惕改善,透过像“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的模范协助“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皇风》),是诗人的历史感于社会政治现实层面的表达。

咏史怀古当然与记史述古不同,因为前者渗透了主观情思和诗化的意象,讲求的是艺术感染力。清人吴乔指出:“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④不必否认,杜牧在古体诗中有时会以直接议论的方式咏史:例如《过骊山作》中谴责秦始皇“黔首不愚尔益愚”,或者上引《扬州三首》之三的“自是荒淫罪”等句子,就近乎“斧凿铮铮”的格调。不过杜牧当然明白,诗歌有别于可以直道是非的史笔或说理文章,必须讲求情韵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裁方面,晚唐之前的咏史诗多用古体,其次为律诗,而杜牧却特别喜欢用绝句体把历史见解融入形象和情事之中,发挥深刻的论史或讽喻作用。^⑤其中部分原因也许是考虑到在君主专制下,不便对本朝皇帝及政治弊病过分直斥,“辞语迂险,指射丑恶”;而托古“旁引曲释”(《与人论谏书》)的绝句最能够“点到即止”,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的效果。然而更重要的是,绝句本身长于含蓄精炼、曲折深婉地把丰富的意思表达出来,亦可以用形象

① 这跟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在心志上没有分别,而杜牧在军政方面的才学识见当更胜杜甫。杜牧上承祖父撰《通典》的家学传统谈政论兵,更尝注《孙子》,为真才实学、兼具文韬武略之士。例如唐武宗会昌年间,朝廷讨伐泽潞藩镇刘稹,杜牧写了《上李司徒相公用兵书》,其中陈述的作战方略被李德裕采纳,结果“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

②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Douglas Ainsli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 12.

③ 欧阳灼校注:《杜牧集》卷一六《上知己文章启》,第219页。

④ 吴乔:《围炉诗话》卷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8页。

⑤ 李商隐的绝句亦显示出类似的倾向。中唐时期擅长以七绝怀古的大概只有刘禹锡,如《乌衣巷》《石头城》《金陵五题》等。有论者认为杜牧的咏史七绝“标志着史论式的七绝咏史诗体经过中唐时代的酝酿和发展,至此已臻成熟,杜牧也因此而成为咏史诗发展长途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刘曾遂:《略论杜牧咏史七言绝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编:《唐代文学研究》第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2页)。

语言溶情入理,结尾尤其可以在转折中荡起余韵,言有尽而意无穷,使篇幅小而内涵大的诗歌牵动读者的想象。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便是用几行文字带出意境韵味的典型例子,特别是其一: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诗和同题另外两首及《华清宫三十韵》一样,是讽刺唐玄宗晚年“亡国亡家为颜色”(《隋宫春》)的昏聩荒淫,使人民历尽苦难,国家有如“鸟啄摧寒木,蜗涎蠹画梁”(《华清宫三十韵》)那样残破腐朽。其一更令人联想起两个多世纪后,苏轼的《荔枝叹》曾以古体诗的方式作过类似的挞伐: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埃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鹧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荔枝叹》一共二十四句,其意旨是上承杜牧诗的,用的手法则是实写明刺,整体风格与中唐《新乐府》之类的讽谕诗相去不远。东坡此诗一开始就点明飞车扬尘的景况,把荔枝和龙眼的运载以及颠坑仆谷的苦役、惊尘溅血的重祸与美人破颜的轻笑并置起来以达到对比效果。诗句的用辞略带夸张,首八句中有五字重复(即“里”“一”“飞”“枝”“尘”),末尾则加上直接的教诲(例如“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全诗道来比樊川诗用力,而不及后者意韵深折。杜牧诗的意旨同样清晰,然而用词飞扬爽朗而含蓄微婉,兼具刚柔之美,艺术悬念及动感空间的构思尤其出色。首先是广角式地摄取锦绣山峦及深宫重苑等壮观景物,然后由外至内,由远到近,由大而小,连绵不断地紧随着动作的方向越过一重重敞开的殿门,最后把镜头聚焦在扬尘飞骑和含笑妃子这两个对照的形象上。殿门“次第”敞开以迎接急速的驿传,描写出来的气氛雄壮严肃,俨然有国家大事赶紧报告。末尾却在一气呵成的节奏中骤然反跌,由第三句使人疑惑的一笑,转折带出原来只因妃子对荔枝的私好,惹得尘土飞滚,人疲马惫。“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余韵与苏轼“知是荔枝龙眼来”的显露刚好相反,更突出唐玄宗和杨贵妃那种不顾民生、类同“烽火戏诸侯”的荒谬行为。此诗但用描写叙述而不涉及怒目横眉的议论抨击,内容及讽意看似轻描淡写,却来得婉转深刻。

单从诗的内容来说,杨贵妃的故事以及“亡国亡家为颜色”的教训算不上含有很特别的历史深度。可以注意的反而是杜牧那种气象万千的历史眼光和笔触。由此亦带出值得留意的另一点,即杜牧没有公式化地重申传统的“女祸亡国论”:若非皇帝下令,荔枝哪得飞骑扬尘而来,以博妃子一笑?在另一首《泊秦淮》中,读者可以看见诗人同样以委婉言辞荡起言外意韵的写法,表达另一层同情的历史见解: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表面上,这首诗的后两句似乎是指责歌女不识大体地演唱“亡国之音”。^①其实作品更应该从侧面讽刺那些只顾放浪酒色、不理天下兴亡的君臣权贵,重申历史上荒淫丧国的教训。试想商女原就是男权文化中的遣兴工具,自身如何能有能力使国家灭亡?不难看出,杜牧的诗在关注历史当

① 《玉树后庭花》曲为陈后主所作。《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载:“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刘昫等:《旧唐书》,第1041页)

中,是颇留心像商女这类小角色的。^①整体的大历史,本来就是众多个体的小历史的总和。壮烈的朝代兴替固然是历史,微末的人民生活也是历史;“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的攘外丰功是历史^②，“闲捻紫箫吹，……饕餮不能饱”(《杜秋娘诗》)的养尊处优、无聊苦闷的后宫日子同样是历史。诗人在放眼今古的感慨中，并没有忘记那些卑微无助、被辗轧于历史巨轮下的牺牲者。^③至于商女，即使不知亡国恨也扯不上需要承担重罪，因为作为古代士人社会的娱乐消遣品，她被界定的社会角色本来就不包括爱国心。就像《金谷园》里落花飘零、堕楼而死的绿珠，只是在石崇和孙秀的政治斗争中遭人摆弄、不由自主的祭品。商女和绿珠一个亡国后仍在，一个于政治斗争中先亡，但其作为牺牲者的命运是一样的。其他如“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的息夫人(《题桃花夫人庙》)、“尔来未几岁，……娉婷为当炉”的歌妓张好好(《张好好诗》)、“事往落花时，……(老)放故乡归”的受累宫人杜秋娘(《杜秋娘诗》)，或者“轻罗小扇扑流萤，……卧看牵牛织女星”的无聊宫女(《秋夕》)，甚至皇帝死后仍然“泪滴秋山入寿宫”(《奉陵宫人》)，被剥夺青春自由“事死如事生”地奉守陵墓的宫人^④等题材，都反映杜牧对沉没于历史过程中的无助受害者的真切同情。^⑤虽然《杜秋娘诗》《题村舍》及《泊秦淮》等有关宫人、农民或歌女的篇章取材自眼前的社会事实和生活体验，表面上似乎不属于“历史”性质的题材，但这些篇什的主角都是超越时代性、在历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小人物。他们是自古传统社会中的弱者，其中像息夫人、绿珠、杜秋娘等的命运，更直接被置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倾轧和国运兴衰中观照，反映诗人是把他们纳入历史思考中的。^⑥何况历史感是贯通古今的，只要诗歌立意通明而不局限于本位的义蕴，以眼前抑或往昔人物为题材并无本质上的必然分别。就像商女的歌声，可以牵起对古来亡国之音的反思。^⑦要之，杜牧对历史的感受并不囿于狭义的时空人事；生命中“人歌人哭水声中”的永恒脉搏(《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正是诗人深刻的历史感的一部分。

当然，在人间世的范围内，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作中还有不少“正规”的历史题咏足以讨论。譬如对历史上大小悲剧和错误的慨叹，自然会荡起对明君贤臣及哲人的仰慕，这是同一怀抱的正反两面。像《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就提过“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即唐太宗坟墓)，表达对唐太宗的怀念，亦折射出对当时政治的失望。在入世志向上，杜牧尤其敬重的是坚忍不屈、有始有终的精神，“直是超然五湖客，未如终始郭汾阳”(《云梦泽》)，反映出诗人认为自己曾多次咏赞的范蠡，其“乘轻舟以浮于五湖”^⑧的出世飘逸，犹逊于“功盖一代，……哀荣终始”的郭子仪^⑨；“包

① 曾有研究表列杜牧诗中的女性形象的社会位阶，其中以下层妇女(特别是娼妓)居多，可以参考。见曾宗宇：《杜牧诗中唐代之“女性形象”研究》，嘉义：南华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7-10页。

②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五，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四三，第1444页。

③ 例如“蓑唱牧牛儿，篱窥蒨裙女。半湿解征衫，主人饷鸡黍”(《村行》)描绘农民的质朴生活及和蔼亲厚；“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题村舍》)写到民间疾苦，叹息达官贵人不能了解下层穷困。这些题材固然不属于直接的咏史诗作，但它们无异间接指出，不谙民情就不能全面认识历史人事，亦不足以成为它的真正传承者。

④ 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引《通鉴唐纪》注，第146页。

⑤ 有关其它为宫女申诉的宫怨诗，可参看《吴宫词》二首、《樊川别集》中的《青冢》及《长安夜月》、《樊川外集》中的《宫词二首》及《宫人家》等篇章。

⑥ 有论者认为杜牧的咏史诗之“往往以女性为议论的出发点，……是由于杜牧个人生活放荡不羁，大量创作与女性有关的诗，形成了思维定势，给他的咏史诗提供了女性观照视角”。观点不无道理，亦有以偏概全之嫌。见段双喜、陈良中：《杜牧咏史诗中的女性观照浅议》，《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

⑦ 又例如“扶床乳女午啼饥”(《题村舍》)或者“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阿房宫赋》)的描写，都无疑连系着一份对千古庶民的关怀和对人间社会的责任感。

⑧ 《国语》卷二《越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页。

⑨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第3467页。

羞忍耻是男儿，……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则指出项羽应该败而不颓，再接再厉；两者都透过史实表达积极进取的思想态度。至于出世情怀方面，像《题宣州开元寺水阁》提到的“惆怅无因见范蠡”或者《郡斋独酌》中对李光颜、朱处士的描写^①，则抒发功成身退的志愿。其他如《感怀诗》中的“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或者在《将赴湖州留题寄菊》里看见“陶菊”“楚兰”时希望如陶潜、屈原“撷芳”等言语^②，都显示杜牧把关心民间疾苦、正义忠诚、却未能一展平生抱负的先贤看成异代知己。咏叹古人，同时也是感怀身世，表达自己的壮志和理想。诗人的历史感，原就是其生命观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历史在主观的意义中不免因为诗人的心境及其身处的环境，牵起不同联想和感受。譬如在君主昏庸或政治紊乱之际，有气节抱负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更感到挫折和矛盾；当他想到千古有志之士也曾经历类似的挫折时，他对历史的看法亦不免抹上一层落漠的暗淡。以杜牧的处境来说，“平生自许少尘埃，为吏尘中势自回”（《书怀寄中朝往还》）、“谁知我亦轻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闻庆州赵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长句》）、“饰心无彩纈，到骨是风尘”（《自贻》）等感慨怀才不遇、正直受屈的感受，都是历史生命的一部分；与追慕先贤及同情不幸者相应而来的，是对彼此共同命运的感慨，所谓“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诗人在《杜秋娘诗》里由“女子固不定”想到“士林亦难期”，由杜秋娘的遭遇而嗟叹“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再归结到历史及人生中一切命运祸福之升沉无定、变化莫测。正如他在《自贻》中体会到，古来像他那样的人都感到“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寂寞怜吾道，依稀似古人”。在这些诗篇里，历史亦成为寄托“历史郁闷”的载体。这种慨叹“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的意绪，有时甚至令诗人由推古及己而愈发感伤：“祇向长沙住岁余”（《朱坡绝句》三首之一）的贾谊，更衬托出眼前“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的内心低沉。^③历史与正道的轨迹，似乎从来没有在人间世真正配合过；诗人所说的“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送隐者一绝》），只一“唯”字，已包含着无尽的沧桑感。

二、自然之化：历史的偶然性与沧桑感

不过，假如人处历史中难免感到飘摇无助或者不可理喻，那么对杜牧来说，历史本身也似乎没有因果清晰、足以掌握的必然原理可寻。个人命运固然受制于身外的环境时势而不由自主；就是宏大的历史进程，很多时也可能只代表某些不测因素的偶然会合。如果上节所引篇什反映政权朝代之由治入乱仍可找到具体的人为原因，倒过来由乱入治（或者由分裂到统一），却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可寻。这不但因为破坏比成全容易理解，更因为在根本的层面上，大道变化玄妙，自然天运岂能尽数掌握于理性推敲之中？这份睿智的体会，正是杜牧的历史感比大多数诗人深刻的地方之一。试看《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① 有关对范蠡的吟咏，除文中所引二首外，亦可参看《西江怀古》。李光颜为唐宪宗时名将，曾领军助宪宗制裁藩镇，敬宗时受册封为司徒兼侍中。朱处士，无可考，或曰指朱道灵。见胡可先选注：《杜牧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8页。

② 亦可参看《偶题》及《江南怀古》等诗作。

③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六《上吏部高尚书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杜牧对项羽的历史评价,这里可以按下不谈^①;但是此诗对历史的想象性猜思,却引起后世读者在不同层面上表达过迥异的意见。例如王安石就反驳“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乌江亭》);胡仔认为此诗“好异而叛于理。……(项氏)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②,一并批评杜牧的判断和手法。另一方面,日本论者山内春夫则称赞杜牧这种假设历史的手法是没有先例可援的创新。^③另一日人小川环树则从作者的情怀着眼,认为此诗是慨叹历史之不能逆流挽转而表达伤感。^④其实咏史本就不必局限于凿指事实。何况即使从诗的表面义蕴来看,王安石及胡仔若非让道德意识停留在衡量个人行为的层面,也应该体认到杜牧的焦点并不在于论断项羽本人,而在于抒发一种忍辱负重、能屈能伸、近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至“死而后已”的不屈意志和积极精神。不但如此,细看诗中似乎含有更深远的意思。从“事不期”和“未可知”等语辞中隐然可见:诗人体会到胜败很多时候系于不能预料的因素,刹那间的抉择往往可以改写结果;而历史在展开中的每一个转折点所包含的潜在变数,都令整个过程的因果推演沾上一层偶然性的意味。此诗语辞直露却见解独到,而且格调雄健爽朗,言带议论而意含哲理,诚足发人深思。晚唐诗人李山甫就曾在《项羽庙》中写到“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汉江船;停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不啻重申杜牧这首诗的两重意义,其中“偶然”二字尤其明确。我们甚至可以加上另一重可能性:构成“未可知”的历史偶然性的因素当中,是否也包括自然天赋的个性,以致我们无法选择的某些本能素质影响了理性衡量,倾斜了片刻之间的抉择?总之,杜牧诗中呈现的历史感的过人之处,主要不在文辞艺术技巧或者在感受历史时比他人浓烈的思情,而在于一份更深入透彻的体悟。

同时体认到人力和偶然在历史发展中的互动作用^⑤,是杜牧诗的历史感较别人更深妙全面的优点之一。譬如东风自身不能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但没有反常风势的配合,周瑜也成就不了这场转折性的战功。因此,历史有理可寻而无定轨可鉴;历史结果只是众多不固定的可能性当中,在某时某地的某一个实现。与此同时,诗人亦看到规律性和偶然性都是自然之道的因素;庄子谓“化则无常”^⑥,指的正是一种变化不测的天道,以及终究无法纳入常规的运作。把历史进程放入自然之道去观照,使杜牧由《题乌江亭》的见地更上一层楼,达到《赤壁》中更精辟独到的体会: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假如刘邦项羽争雄的成败偶然性犹可视作牵系于一念之间的人为抉择,《赤壁》所论的三国历史转向的偶然性就显得更彻底,因为它属于人力控制范围以外的自然因素。对于杜牧由遗物起兴而辨认前朝,自近观引发远思而在后两句中作出历史设想,后世评论者自宋代许顗以来每多偏解。这主要是囿于这首诗所采用的史实细节而给与本位性的批评,或者拘执于字面意思之故。许彦周本人谓《赤壁》诗连“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⑦;胡仔则仍是一贯宣称“牧

① 龚文凯认为杜牧此诗乃表达对项羽作为不幸失败之英雄的同情。见 Wen-kai Kung, *Tu Mu: The Poe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p. 94-96。

② 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五《杜牧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③ 山内春夫:《杜牧の咏史诗について》,《东方学》第21期,1961年3月,第17-36页。载山内春夫:《杜牧の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85年版,第3-45页。

④ 小川环树:《唐诗概说》,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85页。

⑤ 一组纯属偶然的事件却不能构成人类文明的历史;诚如阿隆指出:“A succession of fortuitous events does not constitute history.”见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George Irwi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48, p. 17。

⑥ 《庄子·大宗师》,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5页。

⑦ 许彦周:《彦周诗话》,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6页。

之于题咏好异于人”。^①此后一直有不少附和者。例如赵翼曾引用上举的两首诗,说:“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皆不度时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其实非确论也。”^②清人吴景旭亦谓“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但反过来称赞其“跌入一层,正意益醒,……所谓死中求活也”。^③当代欣赏杜牧诗风的论者亦异口同声认为诗人好用翻案法。^④有关周瑜一败会导致“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可能性,沈德潜批评此句“近轻薄少年语”^⑤;美国论者宇文所安更凭空强调末句意味着未能如愿的性欲^⑥,臆度玄虚,教人摸不着头脑。对于“东风不与周郎便”二句的意思,很多学者都把焦点放在周瑜身上,包括认为杜牧意在嘲讽^⑦或赞美^⑧周瑜的相反看法。在较能放眼于宏观历史的论者当中,何文焕反对许彦周之论而说“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国家不保”^⑨;肯定此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的吴乔认为“《赤壁》谓天意三分也”。^⑩高友工及梅祖麟则立足于三国历史的范围外,说杜牧的修正式历史纯属幻想,以为诗人透过轻浮的拨弄把历史变成闹剧,作为诗歌游戏的材料。^⑪对于高、梅之论,德国学者库彬表示赞同^⑫,龚文凯则反对杜牧轻浮的论调,认为《赤壁》自有其独到的想象创造。不过龚氏没有具体指出此诗背后是否含有深入的历史见解。^⑬

其实,《赤壁》和杜牧不少咏史怀古的诗作一样,同时带出历史想象(手段)和见解(内涵)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柯灵乌说过,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活动并非旁观的物象,而是通过精神去感受的经验”;他特别指出“历史想象”在历史建构中的“结构性”意义。^⑭这无异间接承认,历史本身就是一门尝试叙述真实的想象艺术。何况正如阿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情况,或然性或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⑮因此,“翻案”是艺术效果而不必是书写策略;与其断定《题乌江亭》和《赤壁》使用翻案法,不如承认在自然天运之不定性和偶然性的逻辑范围内,诗人的历史想象比历史学家更具有独立性和自由度。至于历史见解方面,读者无论对此诗的评价如何,首先可以记着的是“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⑯以及“诗人言近指远”^⑰的美学因素。试想二乔一嫁孙策,一嫁周瑜,假若二人沦为俘虏,自然成为国家命运的象

① 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五,第108页。

② 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瓠北诗话》卷一——《杜牧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3页。

③ 吴景旭:《历代诗话》中册卷三四《己集一》,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版,第14页。在吴氏以前,明人何孟春亦曾谓杜牧此诗乃“死中求活语”(《余冬诗话》卷上,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2册,第2001页)。

④ 如谢锦桂毓云:“牧之亦好为反语以见超越。”(《杜牧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36页);彭菊华云:“(杜牧)多用‘翻案法’把(史见)表述。”(《论杜牧诗》,《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王西平云:“翻案法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法。”(《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吴在庆云:“杜牧……不落俗套,往往推翻前人定评,……咏史诗好用翻案法。”(《杜牧论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页)等。

⑤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二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80页。

⑥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3.

⑦ 如彭菊华:“(此诗)意在讥讽……(周瑜)”(《论杜牧诗》,《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等。

⑧ 如朱碧莲云:“此诗……赞美周瑜统率指挥之功,过渡自然……因势乘便,充分利用东风之利。”(朱碧莲选注:《杜牧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⑨ 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6页。

⑩ 吴乔:《围炉诗话》卷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558页。

⑪ 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 “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 1971, pp. 49-136, esp. pp. 124-127.

⑫ Wolfgang Kubin, *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pp. 45-46.

⑬ Wen-kai Kung, *Tu Mu: The Poe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p. 99.

⑭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18, p. 241.

⑮ Aristotle, *Poetics*, ch. 9; in T. S. Dorsch, trans.,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p. 43.

⑯ 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816页。

⑰ 冯集梧语,见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第271页。

征。因此“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句,只是诗人“以少总多”^①带出来的深长意蕴的鲜明表达。何况上面的讨论已经指出,作为男性消遣品的女性本来就是诗人关心的微观历史的一部分,因此这首诗采用的事象性质上完全谈不上有什么“轻薄”的成分。不消说“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直言,变其词耳”^②;更根本的是杜牧的思考没有停留于个别的历史人事表象上,而是把它们提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基本层次。项羽之有可能成功,周瑜之有可能失败,牵涉到的主要并非翻案或者游戏的问题,而是诗人早就看出历史结果的偶然性,随时都可以因为某些人为意外或自然变数而改写。李商隐在《隋宫》中写道:“玉玺无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何尝不是重申历史发展的难测无定?《赤壁》诗千载以下不时遭人误解,正好说明杜牧的历史胸襟和艺术想象,大有胜于后人的地方。

思考和探索历史的人,通常都希望梳理出具有规律性的脉络,把古今的纷纭世事纳入一个因果了然的认知架构里,冀能为世人提供整体性的观照和参考。例如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写作《历史》,为的是“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钦佩的丰功伟绩不致湮没,同时把他们向对方发动战争的原因阐明”。^③西方17世纪科学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部分思想家更“力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思辨找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法则,进而理解现时,预测未来”;主流历史哲学“孜孜以求的目标”是“‘求真’和‘客观’”。^④至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稽(世事)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反映的正是一种古今中外皆尝试透过历史去解释和贯通人情事理的思维。没有多少思考者愿意在理性的历史观里,真正包容历史在自然或者人文层面上的偶然性,因为这样不仅代表承认历史很多时候不可理喻,更无异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历史的教化作用以及人力的积极意义。历史洞察力比他人透彻的杜牧,却在一千多年前的诗作中,直面了历史本质的飘忽无定、变幻难测。

三、从历史到自然:“方外”的历史反思

再往深一层考虑,东风乍起之足以左右国祚,无异于说不论是历史或者个人,毕竟都是乘流于自然变化中的纤毫微末。不消说贵贱贤愚同一死,就是尘世兴衰,终究亦在悠悠“方外”的无尽时空中一体湮没。这也是杜牧诗所进一步揭示的哲理,例如《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从文字的表层来看,此诗大可以被解读为一首借汉喻唐、感叹衰败的哀歌;沈德潜谓:“树树起秋风,已不堪回首,况于无树耶?”^⑤然而与杜牧其他咏史怀古意味的诗篇文本互涉地阅读,这首诗却绝不仅是“借凭吊汉代的衰亡,慨叹唐朝国运的江河日下”^⑥,而是含有更深刻的感叹,叹历史之无常,生命之无助。诗人就像陆机所说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由孤鸟没入天际

① “以少总多”出自《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一言穷理,……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西洋文学批评中“synecdoche”(“举隅法”)一词的含义比较窄,属于刘勰所谓“貌”的范围,但所指的仍是同一基本原则。

② 永瑤总裁,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集部四八·诗文评类一》“彦周诗话一卷”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359页。

③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 Walter Blanco, eds. Walter Blanco and Jennifer Roberts,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3-4.

④ 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78-279页。

⑤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二〇,第680页。

⑥ 周锡饔选注:《杜牧诗选》,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1页。

的景象而神跨宇宙,思接永恒,感受到丰功伟业、朝代更替的人世起伏,都孤寂地销沉于无端无际的澹澹时空里。情景意理和古今未来,都混融于精炼的描写中。可以补充的是,尽管“千秋万古无消息,国作荒原人作灰”(《悲吴王城》),但杜牧面对尘世和生命的无奈感,并没有沉湎于消极的个人意绪,而是具有客观性的宏观历史感。人类反思的属性加上短暂的生命,有时不免牵动几分黯然神伤的情怀,及感慨消逝和被遗忘的意识。然而杜牧的历史感毕竟是爽朗豁达的。陵前无树散凄凉,但秋风不管陵树有无而自起;“商女不知亡国恨”或许令人惋惜,但说到最后,尘世生命有没有国恨私愁可言?既然“屈指百万世,过如霹雳忙,人生落其内,何者为彭殇”(《郡斋独酌》),那么就像《赠宣州元处士》中所说,失落和愁恨只是“人生自不足,爱叹遭逢寡”而已。

在某程度上,这种看法意味着诗人从对尘世历史的人世关心和执着,逐渐转向出世超越的自然生命哲学。《九日齐山登高》正好体现了这份心路历程的转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精神的内在超越,当然并非简单地“一念顿悟”,从此再不回头那么直截了当,而是需要反复过滤去重新肯定。诗人的思情在抒写之际尚未释然,因为他犹在尝试把“尘世难逢”之哀转化为“菊花满头”之乐,说服自己“但乐酩酊,不用含恨”,以“古往今来只如此”的均衡性补偿,去消解心中无可奈何的失落感。不过这首诗的整体倾向仍然算得上情调清扬,节奏明朗,因为它毕竟反映了作者心灵由落寞忧思转到萧爽达观的过渡。两者是同一份怀抱的张力式显现:经邦济世之志受到排斥挫折而令人“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雪中书怀》),然而胸襟高阔者亦循“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一章)的物理,倒过来看透世情,使心境舒卷自如。就像诗人在《齐安郡晚秋》中的曲折体会:

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

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

雨暗残灯棋欲散,酒醒孤枕雁来初。

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

杜牧写《齐安郡晚秋》时官职为黄州刺史^①,心情上却把自己形容为作“野人之居”,得享柳岸风姿、云容水态乃至啸志歌怀之乐,感到闲旷恬静和赏心自得。然而精神的“自如”同时夹杂着几分雨暗残灯、酒醒孤枕、过雁寒鸣的落寞,而这份落寞又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意绪,因为它是跟杜牧对世事“(如)棋欲散”^②、“可怜赤壁(枉)争雄”的感慨交织着的。诗篇由前半首的潇洒开朗,跌入第三联的凄楚孤寂,再释放到结尾处“唯有蓑翁坐钓鱼”的超世淡泊,体悟出千古历史归于平淡的物质和心灵现实。此诗跟《题横江馆》中由凭吊古迹牵起历史全非、江山依旧的感慨,几乎同出一辙:“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业帝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不管孙策和孙权的霸业与王浚(龙骧将军)灭吴的功名如何煊赫于一时之间,历史兴亡的成败得失终究同样归空,唯见江山依旧,苔矶供客钓鱼,静听自然之音。从上面的《过华清宫绝句》《赤壁》等作品到此处所引的诗篇,

① 齐安郡即黄州。时杜牧为黄州刺史;第二句“使君”即自指。

② 此句《樊川诗集注》未作注释,却教人想起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王质烂柯的故事:“信安郡有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俄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辑入《前定录》(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页)一局棋结束而人世已换,比喻对世事变迁的感慨。后来欧阳修的《梦中作》诗亦有“棋罢不知人换世”之语。杜牧“棋散”之语同时也有点感叹个人际遇的味道,参看《寄李起居四韵》:“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

都展现出兼含入世积极于人间和出世洒逸于自然的历史感,一份虽带忧伤而不落于自怜、犹能以达观超越世情的灵动襟怀。两者都有助说明前人为何每以“俊爽”“雄杰”“雄姿英发”^①等评语来形容杜牧的诗风。

心境的灵机有了一种“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题敬爱寺楼》)的舒卷自如,才能体会到“蓬蒿三亩居,宽于一天下”,进而“默与玄相话”,乃成为“身世两忘者”(《赠宣州元处士》)。如斯出世的语辞和语调,岂非直接上承《老子》第一章所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以及《庄子·大宗师》所说的彼此“相忘于江湖,……两忘而化其道”“坐忘”人世价值观念的道家生活态度?一般咏史怀古之作,不论是就往事古迹开展题目抑或借前贤抒发怀抱,内容大都可以纳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入世范畴。^②因此有关的评析,亦相应地集中于这个范围进行。^③以杜牧为例,就有论者明确认为其“咏史诗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咏古人古事,为之庆幸或惋惜;借古喻今,告诫今人或讽谏帝王;叹自己的身世”。^④上面的分析显示,杜牧除了看到历史发展没有必然逻辑的偶然性外,复能跳出历史人事的眼界,把历史放在自然天运的视象中观照。^⑤

应该指出,不少唐代诗人在咏史怀古之际会表达崇尚隐逸的情怀^⑥,有时也会抒发对人事短暂、自然恒久的感受^⑦;但当中却鲜有如杜牧那样具备始终一致、宏观超然的历史透视。杜牧当然亦怀有“岩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秋晚早发新定》)、“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不寝》)、“亭宇清无比,……陶只爱吾庐”(《春末题池州弄水亭》)的隐逸之志,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那份具有客观验证性的历史感,已隐然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面。^⑧换了一种“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宇宙和人生观,不但“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洛阳长句二首》之一),个人得失豁然销散;就是历史本身也不再是壮阔波澜或者荡气回肠的戏剧,而只是融入于均衡一切的时空物化中的短暂起伏。有没有东风之便影响到周瑜和曹操的成败,在这个层面上已无关重要:“可怜赤壁争雄渡”事过痕销后,最终“唯有蓑翁坐钓鱼”。“驰骋功名业帝王”的是非名利场,留下来的亦只有“苔矶空属钓鱼郎”。如此隐然独立于历史成败得失以外的生活模式,在《赠渔父》中更显得形象鲜明:

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

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

① 胡应麟:《诗薮》外篇卷四《唐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叶燮撰、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0页。

② 刘昉等:《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载唐太宗语,第2561页。

③ 见相关的对于唐代咏史怀古诗的研究文字,如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杨民:《唐代咏史诗中的人生理想》,《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周小龙:《唐代的咏史诗》,《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王定璋:《运去不逢青海马——略论中晚唐的咏史诗》,《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等。

④ 王南:《读杜牧的咏史诗》,《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王景霓在《杜牧及其作品》中亦认为杜牧的咏史诗大致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借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广泛议论,抒发个人愤懑之情和忧国忧时的怀抱”;“第二类是针对历代王朝的兴亡,借古讽今,托古鉴今,以抒亡国之痛,告诫人们勿蹈覆辙”;“第三类是借对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重新评论,提出自己一反传统观念的新识见。”说得比王南详细,基本论点略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0页)。

⑤ 若谓杜牧有“道教”思想,则容易产生概念上的混淆。见魏峨:《杜牧思想框架论》,《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周小龙:《唐代的咏史诗》,《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文中引李白的《古风》其十二、王维的《偶然作》及王丘的《咏史》为证。

⑦ 例如孟浩然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岘山》);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等。

⑧ 胡可先在其选注的《杜牧诗选》“前言”中谓杜牧的怀古诗“常常将哲理的思索与历史的议论融化于鲜明的形象之中”,虽限于该文的介绍性质而未详细阐释,基本观点与拙文相近。

注者多把末句的“独醒人”理解为“牧之以屈原自况”^①，此诗亦被解作诗人对世无知音及现实不满所抒发的感慨。这种说法不无合理性。然而我们知道，《楚辞》中的渔父并不嘉许扬己而执着的三闾大夫；所谓“独醒人”既不无偏蔽之处，亦非渔父的知己良伴。再者，《楚辞》中的渔父一看即认出屈原，见其形容憔悴而向他慰问，则仍属于半入世之士，而非真正的平民渔父；杜牧诗中的钓翁大概也是读书人，却是于孤舟寒水畔深泽静钓，度过了“月夕烟朝几十春”的真实渔人。因此，“不曾逢着”可能是“不曾认得”、乃至“不曾留心”的意思；就像杜牧在另一首《渔父》中所说：“白发沧浪上，全忘是与非，……终年狎鸥鸟，来去且无机。”历史人事在世人心荡起的感触，似乎已经牵不动渔父石头般的精神。可以说《赠渔父》的整体意境无疑指向道家世外的飘然独立。这种从历史以外的自然之道去观照历史的洞察，就是后来为杨慎正面发挥、被毛宗岗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临江仙》词的历史哲学：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②

英雄淘尽，青山依然，成败一转，夕阳几度，这些呈现于上阕中的事象都是时空运转上的实际状况；自然意象的鲜明恒久与人事征逐的微茫短暂，也因此形成一组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对比。更堪注意的是到了下阕时，寄身于自然宇宙中的人物已经由挣扎于是非漩涡里的执着“英雄”，换成了“惯看秋月春风”、偶尔相逢于江渚上的渔夫和樵者。他们循着自然的节奏和环境而居，把古今人事都付诸闲谈浅笑和一壶浊酒里；他们的白发象征着一种更安静长久的生活模式，而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从起首的异样对比转化为结尾的融合和谐。这种意境与杜牧诗中的渔父那种“烟朝月夕静垂纶，深泽孤舟几十春，不问凡尘清与浊，芦花寒水自醒人”的生活，颇有一脉相承之妙。

当然，要完全内化及泰然溶入“天地不仁”（《老子》五章）之道，感受上并非如理性了解一般容易。儒士“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让人很难完全抽离于时代沉沦而安身于山川草木之中。自然恒久突显人生短暂，亦容易导人转向消极；“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汴河阻冻》）以及“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金谷园》）的岁月催人，可以使人觉得自然无情冷酷。最低限度，置身于无涯际的时空里，人的身份、认知和能力都显得微不足道，人事历史亦不过犹如尘末琐节。陈子昂面对历史陈迹的荒凉，岂不是同样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就像杜牧在《池州送孟迟先辈》所说：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

月于何处去？日于何处来？

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

酌此一杯酒，与君狂且歌。

离别岂足更关意，衰老相随可奈何！

两个短促而连接的设问，提升了诗歌的感情高度，然后一连串圣贤明君的名字如“跳丸相趁”般“不住”弹出，使那种“百岁一瞬，万古为灰”的感觉把心思压得透不过气来。既然如此，诗人除了“与君

① 分别见周锡饬：《杜牧诗选》，第217页；朱碧莲：《杜牧选集》，第210页。

② 王文才辑校：《杨慎词曲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狂酒歌”外,就只好感慨生命及历史之不可究问:

往事不可问,天地空悠悠。……

人生一世内,何必多悲愁!(《洛中送冀处士东游》)

此处勉力自解的旷达,在“不可”及“何必”的语调中带有伤感无奈的味道。不过困惑与体悟原在一念之间;再多两分对历史人事的透悟,便接近《早春题真上人院》中所领会的:

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风烟又一春。

寰海自成戎马地,惟师曾是太平人。

这首诗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之一,在于它似乎同时兼含最少两层的历史意义,而诗人自己是否完全意识到其中较深的一层意蕴,读者也无从确定。此诗的原注既然谓上人“生天宝(742-756)初”,尾联又把“寰海戎马”的时局和“曾是太平”的往昔对比,则对历史盛世的思慕似乎相当明显。^①然而细想一下,僧人不但曾经是盛世中的太平人,而且在已成戎马之地的时势中,依旧度过“古寺风烟又一春”的岁月。也就是说,“曾”亦是“仍”,甚至是“长”;僧人像渔樵一样,早已把小我的意识和精神融会于大化之中。从评点历史的盛衰发展到思考历史以外的人事与自然,也许才是这首诗的深层意义。

四、楼台烟雨、有无之间的历史感

历史与自然之间的互相观照,在杜牧的咏史怀古诗中是时时可见的。李白曾经写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玲珑清朗地带出人世短暂与自然的相对永恒;杜牧诗中的意境,却隐然弥漫着几分烟雨参差的朦胧韵味。商女的无知歌声,交融着一笼清静寒寂的烟纱水月,更似乎咏唱出世间对历史人生揣摸不透的茫然感(《泊秦淮》);秋风拂树,岁岁往来,万古人迹犹如孤鸟一样,沉没于澹澹长空之中(《登乐游原》)。下面所引的诗篇,正是呈现这种艺术意境的典范例子: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跟上面谈到的《题乌江亭》《赤壁》《登乐游原》《早春题真上人院》等篇什一样,这首诗不宜局限于本位解读,即仅视之为“表现了六朝的覆灭,同时……映衬出晚唐衰微破败的政治形势”。^②诗中抒发的历史感慨无疑以六朝消逝为起点,但笔触却透过伸延性的联想,展开为神游于今古自然之际一份更深远而带着迷蒙感受的思绪。诗中最少有两层思考历史人事的意义:首先,“六朝文物”的繁华起伏不论相对于“人歌人哭”或“天澹云闲”,都显得飘渺空无。以朝代政治、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从来是最短暂、直线式及包含偶然性的,惟有自然的存在才谈得上相对永恒、循环更生及具备独立的规律。与此同时,宛溪的平民百姓虽然世代生活于水边而较少受到事物兴替的冲击,但人间独特的感情和价值结构,仍不免世代地人歌人哭,荡魄回肠。自然的生机往复,却是鸟去鸟来、风雨草树的“不仁”模式。诗中交融着深刻的时代感、历史感和自然感。

① 例如朱碧莲认为:“(后)两句讥天宝后即不复有太平之日,隐含不满,渴望统一安定。”(朱碧莲:《杜牧选集》,第82页)

② 彭菊华:《论杜牧诗》,第37页。

诚然,自然物象并非全部是永恒或者更生的。但即使撇开山石坚固、花木再荣而把焦点放在江水流逝、鸟兽死亡、风云难测等性质似乎比较接近人事的现象上,它们亦只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并不涉及人事中特有的思情怀抱和世间境况所带来的历史感触。无限的自然时空,本来就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庄子·大宗师》)的运行和延续,是一种人类只能想象而无法完全体会的永恒存在。一般人的时空观念,都集中于眼前的生活范围中由生到死那段短暂而相对的有限过程;能够思考往昔人事,意识中已算得上增加了深浅各异的历史感。假若进而于精神上超越两种时空之间的对比和张力,就可以在更高远开阔的境界中安身立命。时空感也许是历史感的基础,却绝不限于历史层面的微茫感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①“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诗句所表现的,都是一份乘流于无涯际无终始的“自然时空感”。同样地,《题宣州开元寺水阁》中的古今,是天澹云闲的自然时间,与孟浩然所说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而使人“读罢泪沾襟”(《与诸子登岷山》)的历史时空不同。欧阳修“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贾青道“客意自南北,山光无古今”(《黯淡院》);薛季宣“青山不解知兴替,销黯开颜为雨晴”(《武昌怀古》),等等。这些诗句表达的都和孟浩然的诗相关,即从人事的角度去体验时间才有古今或历史之感。于杜牧而言,“惆怅无因见范蠡”也好,历史上有没有范蠡也好,诗人的心灵从追慕前贤到放眼五湖,从即目之景到言外之意,都隐然透着一种人事朦胧浩淼、生命混沌缭绕、终究如“参差烟树”般的体会。形容《题宣州开元寺水阁》为“极洒脱”未必尽确,但赞它“全在景中写情,……极含蓄”是切实的。^②诗人的精神并非了无牵系地一跃而超越方内时空,而是在感慨尘事之余,浮游于浑远而带点迷茫的历史及自然境界中。

古今论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份深邃而带着几分混茫的历史感,才是杜牧的历史思考最与人不同的特色。再看这份感觉在其他诗篇中的展现: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

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

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

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独酌》)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

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

……

阅景无旦夕,凭栏有千古。

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题宣州开元寺》)

从表面文字来看,这三首诗都提到寺庙。杜牧曾写过《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力斥佛教组织宣扬“地狱罪福”的谬说,又抨击佛教藉本身的特殊社会地位长期为天下寄生,加重人民的负担;文中更揭破工商官吏诈掠搜刮又迷信佞佛,企图“买福卖罪”的鄙妄心态。^③因此诗人某些涉及佛

① 分别见古诗《击壤歌》及陶潜《桃花源诗》。

② 许印芳语,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册卷四本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③ 欧阳灼校注:《杜牧集》卷一〇,第148-150页。

教题材的篇什,很容易被看成是抨击释氏之作;例如《江南春绝句》,就被视为对迷信奉佛的南朝皇帝乱耗民资奢侈建寺的讥讽。^①这是对此诗第一层次的演绎。然而杜牧和绝大部分的传统儒士一样,并不狭隘封闭地排斥释氏的哲理;除了在《早春题真上人院》中尊称僧人为“师”外,“闲爱孤云静爱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和“始觉空门意味长”(《赠终南兰若僧》)等诗句皆为明证。更重要的是,这三首诗提到的寺庙都是倥偬戎马后的“亡国”“遗寺”,说明它们是作为历史古迹和盛衰的象征物感发着诗人,勾起一份超越本位的缅怀思绪。在“亡国去如鸿”和“万古一飞鸟”的视象里,遗迹都隐藏于深烟暗坞中,寄托于“风绕松桂树”(《题宣州开元寺》)、“长空碧杳杳”的天地之间。诗人明白“阅景无旦夕,凭栏有今古”,于是乘化自然无间,凭吊人间有情;而“愁醉闲多少”,亦在乎游心于两者之间的分别。能够超乎历史人事而体会到“秋毫泰山小”,就可以随意地“独佩一壶游”“前山看春雨”。尤其是在最含蓄蕴藉、文意婉曲的《江南春绝句》中,诗人游目于“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气氛,看到村临水,郭依山,酒旗迎风拂动,人民遵循自然生活的景象;而繁华事散的寺庙楼台和它们所包含的南朝历史,却慢慢模糊湮没,笼罩于一幕混沌迷茫的烟雨之中。这令人联想起唐末韦庄咏怀古迹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首诗的意境亦是一份“历史如梦,水木烟笼”的混茫感,只不过写得更凄迷柔婉而已。总之,隐然表达对于今昔盛衰理不清、摸不透的寄寓,以及介乎出世与入世、自然与人道之间的感慨,大概才是杜牧这几首诗的深层义蕴。

以上是就历史人事与自然天地相异的层面而言;除此之外,杜牧的诗歌也展现出人事溶入自然的意境和体验。像渔樵这类象征体认自然之道的人物,固然不时见于杜牧的抒意篇什;在上引的《江南春绝句》中,我们也看到嵌入于“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点点人迹,就像《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的歌哭之众,不论自身意识与否,其哀乐之音都溶入逝水飞声之中。到了如《山行》的体验,历史就更无足轻重,人也只是宇宙整体内的微小分子而已: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诗中是寒山远意的自然空间与情调:径顺山势而开,家傍白云而并立,人依自然而活。诗人由眼前的霜叶联想到春花,此际的时间感是源于往复更替的自然时间而非论述得失成败的历史时间;人的终始和身份都安静地纳入自然之中。再看进一步与宇宙融合的意境: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安秋望》)

假如说《山行》中的石径、人家和车子仍算得上是比较清楚的人文痕迹,《长安秋望》中的人迹(只一“楼”字)以至诗人的位置都似乎更渺小隐晦了。有论者指出这幅图画予人以“气势豪俊、明丽爽朗的艺术感受”,而“在这感受中,我们的胸襟仿佛随着旷朗开扩,精神也在诗的意境气势中顿然抖擞焕发”。^②就目下课题可以补充的是,两首诗的“人事感”都很淡薄,遑论一般意义的“历史感”。它们也没有因循文人悲秋的习惯,反而像刘禹锡的《秋词二首》那样^③,描画出一片生意盎然、气魄清越的清秋景象。如果历史在高爽的南山秋色中显得更不着边际,而人事在明净若镜的天空映照下亦烟消云散,这些体会都没有带来惆怅和失落:凡尘飘散、眼界净化后所留下的是一份与天

① 例如张表臣的《珊瑚钩诗话》认为:“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诗人侈其楼阁台殿焉。”(冯集梧注:《樊川诗集注》,第426-427页)周锡饗注此诗时谓杜牧:“巧妙地掺入了对佞佛求福的统治者的讥讽。”(周锡饗:《杜牧诗选》,第195页)等等。

② 吴在庆:《杜牧论稿》,第209页。

③ 如《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地同游、与自然之道冥合的超拔之感。

这种自然超拔和历史淡微的精神和艺术意境,很多时都呈露为诗篇中辽阔开朗的时空幅度。就像下面的一些例子:“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登乐游原》)“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江南春绝句》)“天接海门秋水色,烟笼隋苑暮钟声。”(《寄题甘露寺北轩》)“垂楼万幕青云合,破浪千帆阵马来。”(《怀钟陵旧游》四首之二)“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西江怀古》)“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独酌》)“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安秋望》)不论是山水天空抑或云楼鸟树、夕阳明月还是千秋万古,这些诗句所描绘的景象都意境开阔,气势磅礴,正与诗人俊朗挺拔的眼界胸襟互为表里。构成如此气势和意境的修辞因素之一,在于诗人喜欢以数字入诗。有论者曾经为杜牧诗中的数字作过统计,发现“一”为最常用的字,出现次数较其次的“百”“万”“三”字多近两倍;又认为这些数字虽然没有多少意义,却可以增加诗的韵律美。^①其实数字的运用如何能够增添诗的韵律美,倒不容易确切证明。反而在艺术联想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既能够增加事象具体可量的感觉(尤其是较小的数目字,例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二十四桥明月夜”或《题齐安城楼》中的“故乡七十五长亭”等),亦可以牵引想象高瞻远寄(特别是容易使人产生远大感觉的“千”“万”等大数字),纵横开合,涵今古天地于胸中。诚如《文心雕龙·神思》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数字运用颇有助于神思“接通”宇宙之效。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时间感和空间感的交互渗透,呈现于即目的景象之中:万古销沉体现于飞鸟没入长空(《登乐游原》《独酌》),犹如六朝文物、南朝寺庙置于时间古今中得到透视一样。总之,自然的无尽恒久和历史的微小短暂,都在杜牧诗歌广阔的时空幅度中展现出来。

不过,就杜牧诗中含蕴自然之道去观照尘世的历史感而言,最具特色的仍然是那种烟雨迷蒙、看不清、摸不透的意境。怀抱着入世理想的传统儒士,大都对历史有一份执着,既强调它的启迪性,本身亦对它怀有任重道远的承担感。另一方面的超越世情之士,自当领悟“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真意。至于杜牧咏史怀古时所展现的历史感,则在兼含儒家与道家生命观的同时,还有一份处于两者之间的混茫感。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过,杜牧敏于体会自然的神采意境,尤其是欣赏清秋的气韵而并不沾染一般文人悲风苦雨的习惯。虽然他也写过“秋色无不搅离心”(《齐安郡中偶题二首》之二),不过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一种明丽洁净、高逸清爽、生意盎然的景色:“疏雨洗空旷,秋标凉意新。”(《早秋》)“凉风满红树,晚月下秋江。”(《秋晚早发新定》)“川光初媚日,山色正矜秋。”(《秋晚与沈十七舍人期樊川不至》)正因如此,当杜牧把历史人事置于自然中观照而显现不出那么明净高爽的景象时,我们就更能感受到诗人心灵视象的转变和它的艺术意义:“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题宣州开元寺》)“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酌》)“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泊秦淮》)“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赠渔父》)“清羸已近百年身,古寺风烟又一春。”(《早春题真上人院》)“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这些景象既是自然景色的画面,亦是历史人事的画面。与上一组诗句有别,此处最突出的是含着迷惘微茫韵致的“烟”字,意味着人事历史是照不清、参不透的。事实上,假如要从杜牧的咏史怀古诗篇中拈出一些最具特征性的景象,它们所呈现的大概是一个由“天澹云闲”“深秋风雨”“参差烟树”“长空孤鸟”“万古销沉”

① Wen-kai Kung, "The Prosody and Poetic Diction of Du Mu's Poetr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1979, pp. 281-307.

“前朝烟寺”“楼台烟雨”“烟笼寒水”等艺术元素复合构成的幽婉意境。特别是诗人心目中的自然景象,很多时都类近李白那样在时空幅度上带着一种远大的气魄,令历史在寥远无涯的宇宙中显得更微小朦胧。因此,在杜牧的诗中不涉及沧桑世情的自然景象是明丽超拔的,但就诗人透过自然之道观照尘事历史的感受而言,读者印象中最深刻和鲜明的,却是几分笼着烟霭看世间的意味——那种“烟笼寒水月笼沙”“参差烟树五湖东”“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体验。

五、结 语

美国学者傅汉思曾以二十首律诗和古诗为例(其中并无包括杜牧的作品),归纳出唐代咏史怀古诗的某些基本元素,其中包括登高、配合怀古的望远、山河永在与人生短暂的对比、过去的人物古迹、不含历史联想的山水描写、涕泪、时间流逝、秋意、暮色、往昔光辉与目前衰朽的对照、悲伤及飘零感等。^①这些元素当然不必全套出现于每一首咏史怀古诗中,因此本文也不必详细考核它们是否都被杜牧的有关作品所采用。可以指出的是,杜牧的咏史怀古诗篇并不囿于某些因袭式的手法;他擅长的咏史绝句体裁,本身也没有多少可以重复使用的公式化元素的空间。至于涕泪、悲伤及飘零感等,更不是“雄姿英发”的杜牧诗中特征性的元素;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何必多悲愁”和“牛山何必独沾衣”的自解,以至更英雄和洒脱的胸襟。缪钺认为:“杜牧诗风格的特点所以能成为‘雄姿英发’,就是因为他……积极有为,虽然有时忧伤抑郁,但是又能以豪放旷达出之,所以我们……感觉到一种爽朗、峭拔、俊伟。”^②此说言之成理。这种风格置于晚唐诗坛的整体情调中尤其显得出众。有论者认为:“浓郁沉重的感伤是晚唐咏史诗的情绪基调。”^③这类咏史诗多少渗透着士人们的“自我贬值意识”,一种“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以至)否定”的思绪。^④相关论述合共引用了李商隐、温庭筠、罗隐、章碣、刘沧、李频、许浑、韦庄等诗人的作品为证,却如傅汉思的文章一样,并没有提及杜牧的诗篇。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诗根本没有弹过类似“东风无力百花残”的绝望调子。杜牧的诗有飘逸豪放而无自怨自怜,原因之一正在于他那份超越自身穷达及人事成败的自然视象和历史思情。

古今的论者大都同意,杜牧的诗风尽管随着生命经历的打磨而发展及转变(例如前期比较意气风发,后期增添了深沉蕴藉),然而其笔触始终保持着雄姿英发的基调。^⑤我们知道在中国抒情诗歌的美学传统中,诗风不仅反映艺术风格的技巧取舍,也是诗人胸襟性格的体现。杜牧的诗风能够兼具爽朗蕴藉之美妙,除了因为关心家国的入世情怀外,亦在于他那富有哲学深度而带有出世意味的历史观,使诗人对生命和人事的看法较少受到一己际遇及时局起伏动摇,而始终贯彻着一份自然之道的妙悟。自然的无涯让历史人事显出渺小短暂、“不外如是”的本相。诗人以宏观的眼光和超拔的胸襟参照历史、人生、自然,由小见大,往复时空,收放自如,并且以俊逸的格调和清

① Hans H. Frankel,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Past in T'ang Poetry,"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s. Arthur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45-365, esp., pp. 345-351.

② 缪钺选注:《杜牧诗选》“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③ 王红:《试论晚唐咏史诗的悲剧审美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④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⑤ 借刘熙载此语形容杜牧诗的学者很多,如上引的缪钺和寇养厚,及谢锦桂毓、彭菊华、王南、王西平及张田等。王西平氏说杜牧的风格虽历多变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调仍是豪爽俊健”(《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谢锦桂毓亦谓牧之诗即使“于缠绵悱恻中,仍不失小杜英爽俊拔之本色”(《杜牧研究》,第139页),等等。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例如王景霓认为杜牧的诗“有时表现得昂扬,有时凄侧,而且凄侧的成份居多”(《杜牧及其作品》,第55页)。

婉的语言,把既博且深的艺术意境表现出来。积极用世的热切不减随遇而安的潇洒,立论出众结合着含蓄蕴藉,时而澈净昂扬,时而深婉迷蒙。不管是穷困或者得意、少年还是暮年之作,杜牧的咏史怀古诗始终以自然解读历史,散发着一股融合豪雄、柔婉与达观的挺拔之气。

对于文学写作,杜牧曾经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的见解(《答庄充书》)。这与刘勰谓“文附质,……质待文”的观点(《文心雕龙·情采》)是一脉相承的。诗人“寄志于言”(《答庄充书》)、“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的写作观念,说明他是言志抒情诗的传承者,虽求新意而不务于“徒有其奇”。杜牧咏史怀古时之自出机杼,其实只是以结合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的聪慧才识去观照世态事物,同时实践自己的创作信念,给历史人事赋上新的角度和体会,不必涉及什么“好异于人”乃至“翻案拗辟”的创作动机。这是自然之道给予人文之道的释放性启迪。有了透视和超越的艺术胸襟,诗人就更能够以神驭貌,以精辟透彻的语言表达所思所感;无怪乎在杜牧以后,七言绝句几乎成了咏史专体,因为绝句讲求的本来就是一种以神驭貌的抒情美学。在紧扣个别故实或者泛引历史往昔之余,诗人进一步使特定的观察展延到普遍性的体会,提升到具有总结性的透视层面。他的思考不但能够体察前人所未及之处,而且能更立足于历史以外的自然衡量历史,因此往往能在根本原则上抓住历史变化的关键所在,予人一种在想象之中而出乎意料之外的见解和启示。诗人的历史及哲学胸襟既然揉合了自然之道,当然能够更随意地以抒情及形象配合议论及叙事,使其诗篇增添情韵的深度,令其意念赋上形体和生命。情意共鸣、形象感染和思想启迪,配合不时采用的修辞式反问,使杜牧吟咏历史的诗歌更意味深长,荡人思绪。^①

然而诗人的历史感最发人深思的地方,始终系于那个几乎不能自己的“烟”字。可以重申的是,“烟”在杜牧的诗中绝不只是一种唯美的意象或标新的构思。“青山隐隐水迢迢”(《寄扬州韩判官》)的迷蒙景象,也许可以折射出晚唐微茫的国运;但更根本的是,它贴切地体现了诗人对历史今古的感受。历史可以作为镜子警惕现在及启导未来,可以激励慰藉或加深惆怅,亦可以证明生命从古如斯,甚至使自身在无涯无尽的自然宇宙中显得不着边际。所谓历史感总不免受到个人的性情、思想、怀抱、经历、世界观、以至身处的历史形势所影响,严格来说无疑源于“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意识^②,杜牧当然不会例外。可贵的是,他咏史怀古的诗篇除了在抒发个人怀抱时能自出机杼外,更能够意识到自身和人事的限制,从而超越历史的范围作客观远大的自然透视,添上几分“以物观物”的味道。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宏观或微观地探究历史,反映历史及讨论兴亡,从关心国计民情进而反思乃至怀疑历史的根本意义。诗人似乎亦意识到“人同时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和客体”^③,而主体既然有限,本质飘忽不测和短暂不常的历史就显得更难捉摸。诗歌吟咏中的杜牧,当然不是纯理性思维的哲学家或者定论古今的史评家,而是以诗人真诚深挚的情怀、纵横时空的气度、敏锐入微的体察以及达观豪爽的精神,用形象的语言和抒情的语调,或直切或婉转地表达出他对生命世事的独特领会。这种游心于人事与自然、古今和天地之间的多面视象,令杜牧的诗歌投射出来的历史轮廓显得不大清晰:它既非全是儒家肩负为己任的人间世,亦非全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和谐绚烂的自然,而更近似如烟似雾、流动朦胧的复合意境。

① 本文并非探讨杜牧诗歌艺术的专著;这里所勾画的是诗人在表达历史感时所呈现的一个艺术轮廓。

② 王国维著、徐调孚注:《人间词话》,香港: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崇尚性灵的袁枚更正面强调应以我观物:他曾说咏史诗要“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卷一四第七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意思是说,亲身的领会容易使意高语新。这个看法就艺术上避免公式化拾人牙慧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其着眼点却不在历史眼界的阔窄方面。

③ Raymond Aron, *Politics and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trans. and ed. Miriam Cona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p. 5.

这个抓不紧、诉不尽、“历史人事有无间”的混茫意境,代表着高远深刻的哲理立意与含蓄精炼的美学形式的艺术结合。特别是杜牧的咏史怀古绝句,很多时候情、景、理交融,兼具诗意及画意地描绘出优美的气氛和景象,抒发着语浅意深的体会,使诗中的历史感散发出历久常新的艺术感染力。要真正诠释前人对杜牧诗“远韵远神”^①“风华蕴藉,增人百感”^②的赞赏,大概需要领会诗人这种委曲深远的神韵、迷茫蕴藉的玲珑,在半着意半牵情中浮游于浓淡虚实之际,往复于自然与人世之间,最终使人回味无穷。也许这种“托兴幽微”^③的美感体味和琢磨不清的心神领会,才是最真切的历史感吧。

Thousands of Pavilions in the Foggy Rain: Reading Historical Awareness in Natural Law through Du Mu's Poems

Kuang Yanzi

Abstract: Poets in Tang Dynasty who liked to sing of history are not small in number, and Du Mu can be among the best of them. Du Mu's poems that sing nostalgically of history show various degrees of historical awareness. His concern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nation and his wish for his readers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poets throughout history who entertained a certain ideal for the society they lived in. However,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in Du Mu's poems is profounder.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the sense that Du Mu could tell the accidental and unpredictable aspects of history. He would then look at history from a position beyond the scope of history and show the transient, insignificant, and disoriented nature of human history within the cosmos. His mind often shuttled betwee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world and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between his sense of social commitment and his sense of detachment from human world, and between his care about and indifference to earthly reputation. He realised that the contour and meaning of human history could not be clearly defined when human history was posited against the limitlessness of space and time. His poetic images, like the branches hazed by the dim fog, birds in the remote sky, and the pavilions in the foggy rain, together with their connotations are different both from Confucian belief in social commitment and from Taoistic inclination to leave the world behind. These images body forth the poet's transcending and penetrating views of history, which, though often overlooked, are what make the poet a master of his own school.

Key Words: Singing of History; Awareness of History; Natural Law; Quatrains

【责任编辑:陈 宏】

①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二〇,第680页。

② 贺贻孙:《诗筏》,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册,第190页。

③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凡例》,第4页。